



东方诺贝尔文学研究

——从泰戈尔到莫言

侯传文 王汝良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文丛·重点项目



东方诺贝尔文学研究

——从泰戈尔到莫言

侯传文 王汝良等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诺贝尔文学研究：从泰戈尔到莫言 / 侯传文，王汝良等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5

ISBN 978-7-5161-8173-7

I. ①东… II. ①侯…②王… III. ①东方国家-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学研究-现代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0247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刘 娟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4.75
插 页	2
字 数	394 千字
定 价	8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在长期的教学与研究过程中，我对东方诺贝尔文学现象一直比较关注。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万众瞩目的世界大奖是由西方人设立的，评委基本上都是西方人（当然是西方文学与文化界的精英），东方作家获奖难度很大，需要突破许多障碍。在东方，获奖不单是作家个人的事，也不仅是纯粹的文学现象，而是包含更多的民族文化因素，能够传达诸多世界文学与文化方面的信息。1994年，当日本作家梅开二度、大江健三郎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之时，我终于不再停留于内心感慨，开始对这一重要现象进行系统思考并付诸笔端，写成《东方诺贝尔文学断想》一文，在《青岛文学》1995年第5期上发表。后来，东方作家频繁获奖，进一步激发了我对有关问题的思考，2005年，与研究生王汝良合作，写出《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东方诺贝尔文学》一文，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并于当年申请获批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多元文化的张力——东方诺贝尔文学研究”。在此前后，除了自己对有关问题进行思考研究之外，我在指导研究生论文选题时，也有意识地向这方面靠拢。研究生们的学位论文为本项目的完成打下了基础，初稿于2009年基本按计划完成。然而，统稿修改比预想要困难得多，补充完善、整体提升、统一体例等工作使书稿的最终完成延迟了许多，加之出版经费不足，与读者见面就一直拖到了现在。尽管经过了长时间的反复修改，文稿仍然不敢说完善，缺点与错误恐难避免，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由总论和七章构成。总论主要从“东方的发现”“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民族自信与文化自觉”“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张力”“人文精神的弘扬”“现代性的表现”“后殖民文学现象”“东方文化的复兴”八个方面对东方诺贝尔文学现象进行透视和分析。正文七章是泰戈尔、川端康成、索因卡、马哈福兹、戈迪默、大江健三郎、库切七位获奖作家的专

题研究。需要说明的是，获诺贝尔奖的东方作家不止上述七位，应该纳入视野的还有以色列的阿格农（1966 年获奖）、移民作家高行健（法籍华裔，2000 年获奖）和奈保尔（英籍印裔，2001 年获奖），但由于他们是否属于东方作家还有争议，故没有将其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另外，在课题立项之后，又有土耳其的帕慕克和中国的莫言分别于 2006 年和 2012 年获奖，我们在总论中将他们纳入了论述范围，专题研究只能留待将来了。

本书是集体合作的产物。主要作者及分工如下：

总论：侯传文、王汝良

第一章：侯传文（第一、二、四节）、周静（第三节）

第二章：侯传文（第二、三节）、丁文（第一节）

第三章：王汝良

第四章：侯传文（第一节部分，第四节）、黄丽（第一节部分，第三节）、马征（第二节）

第五章：郭薇华

第六章：王士民

第七章：何兴华

本书由侯传文、王汝良统稿。另外，马征在青岛大学工作期间，为本项目做了一些前期工作；研究生郝玉芳、丛萍等撰写了相关论文，限于体例和篇幅，成果没有收入本书；在读研究生管春梅、高洁、孙明香做了一些辅助性工作。特此说明，并致谢意！

书成之际，感谢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立项资助！感谢青岛大学文学院两任院长姜振昌、刘怀荣对本项目的关心和支持！

侯传文

2015 年 4 月 20 日

目 录

总论 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东方诺贝尔文学	(1)
一 东方的发现	(3)
二 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6)
三 民族自信与文化自觉	(10)
四 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张力	(14)
五 人文精神的弘扬	(18)
六 现代性的表现	(22)
七 后殖民文学现象	(26)
八 东方文化的复兴	(29)
第一章 泰戈尔——机械轰鸣中的天籁	(34)
第一节 跨时代的文化巨人	(34)
第二节 “世界诗人”的世界	(40)
一 人生与爱情	(40)
二 自然与儿童	(44)
三 宗教与哲学	(50)
四 政治与社会	(55)
五 艺术风格	(58)
第三节 短篇小说现代性	(64)
第四节 中篇小说探索	(88)
一 创作历程	(88)
二 形象系列	(94)
三 艺术特点	(103)
第二章 川端康成——民族性与现代性的二重变奏	(110)
第一节 艺术探索变奏曲	(111)

第二节 唯美精神	(132)
一 非政治性与非现实性	(133)
二 非道德性	(138)
三 自然美	(144)
四 女性美	(149)
第三节 川端康成与新感觉派	(156)
第三章 索因卡——非洲的莎士比亚	(175)
第一节 为人生艺术	(178)
一 非洲大陆苦难现实的记录者	(178)
二 痛恨专制 吁求自由	(182)
三 形而上的人性关照与思考	(185)
第二节 后殖民创作：反抗与迷茫	(188)
一 索因卡与非洲后殖民文学	(188)
二 民族性艺术形式的坚守	(189)
三 对殖民主义的揭露和批判	(192)
四 文化选择的迷茫	(197)
第三节 融欧非艺术于一炉	(199)
一 隐喻与象征	(200)
二 玄幻与荒诞	(202)
三 继承与借鉴	(205)
第四章 马哈福兹——现代说书人	(208)
第一节 两种文明的儿子	(208)
第二节 家庭模式与现代埃及民族的精神变迁 ——马哈福兹的“开罗三部曲”	(218)
一 恪守传统的第一代人：以“父”为尊的家庭模式	(218)
二 失落信仰的第二代人：家庭神圣性的消解	(223)
三 回归信仰的第三代人：新式家庭模式	(226)
第三节 马哈福兹小说的叙事艺术	(229)
一 总体叙事特征	(229)
二 叙事主体	(236)
三 叙事结构	(249)

四 叙事本质	(260)
第四节 《米拉玛尔公寓》与东方现代主义	(268)
第五章 戈迪默——南非的良心	(278)
第一节 走向世界的“南非文坛耆宿”	(278)
第二节 文学思想探析	(284)
第三节 知识分子情怀解读 ——以《自然变异》为中心	(289)
一 真正的知识分子	(290)
二 独立的批判意识	(293)
三 深沉的历史责任感	(301)
第六章 大江健三郎——直面危机与想象拯救	(309)
第一节 个人生存的危机	(310)
一 监禁状态下的“性的人”	(311)
二 残疾儿引发的危机意识	(317)
三 灵魂与信仰的危机	(322)
第二节 日本民族与人类世界的危机	(325)
一 民主主义者	(325)
二 核与暴力下“老人的愚行”	(330)
第三节 拯救的想象力	(334)
一 建立“乌托邦”	(335)
二 向往“新人”	(339)
第七章 库切——东方白色飞鸟	(346)
第一节 自我放逐中求生存	(346)
第二节 “理想倾向”的不懈书写	(350)
第三节 后殖民语境下的写作	(361)
第四节 生态主义思想	(368)
主要参考书目	(378)

总 论

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东方诺贝尔文学

从1901年至今，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共有111位作家相继登上瑞典文学院的颁奖台。^① 尽管人们对该奖有这样那样的非议，对评委们的眼光和立场或有微词，但作为世界范围内文学创作领域的最高荣誉，诺贝尔文学奖一直备受重视，并且还将继续受到全世界的作家、文学研究者以及文学爱好者的关注。

东方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为引人注目。自开奖以来，诺贝尔文学奖绝大多数授予了欧美作家。由于该奖是在西方文化圈中设立、主要由西方人评定的，文化的差异和语言的障碍使得东方作家竞争该奖颇为困难。从1901年至今举行的一百多届评奖中，只有十位东方作家摘得这项桂冠，他们分别是：泰戈尔（印度，1913），阿格农（以色列，1966），川端康成（日本，1968），索因卡（尼日利亚，1986），马哈福兹（埃及，1988），戈迪默（南非，1991），大江健三郎（日本，1994），库切（南非，2003），帕慕克（土耳其，2006）和莫言（中国，2012）。^② 另外，

① 数据截止到2014年。因两次世界大战，诺贝尔文学奖在1914年、1918年、1935年、1940年、1941年、1942年、1943年未能成功颁发。诺贝尔文学奖也曾4次被两人分享。

② 关于“东方”和“东方文化”的范围，学术界有不同观点。一种意见以季羨林先生为代表，认为东方文化主要包括三大文化圈，即以中国为中心、以儒道和汉化佛教为标志的东亚文化圈，以印度为中心、以印度教和佛教为标志的南亚文化圈，以阿拉伯为中心、以伊斯兰教为标志的西亚北非文化圈，不包括南部非洲；另一种意见以目前通行的《东方文学史》或《外国文学史》教材为代表，认为东方是与西方相对而言，非西方即东方，“西方”主要指欧美，“东方”则包括亚洲和非洲，即除了上述三大文化圈之外，还包括南部非洲及中东的以色列和土耳其，但作为外国文学的一部分，其“东方”一般不包括中国。本书在“东方”范围问题上持大东方观，但论述有所侧重。比如在讨论文化问题时，侧重没有争议的、典型的东方作家，如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川端康成、埃及的马哈福兹和中国的莫言等。关于“东方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侯传文在《“东方文化”正义》（载《东方论坛》2013年第5期）一文中比较有详细的阐述，可参看。

还有两位颇受争议的移民作家高行健（法籍华裔，2000）和奈保尔（英籍印裔，2001）。

在西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作家个人的事情，至多会影响到某种文学思潮的兴衰。而在东方，获奖的作家大都代表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作家获奖往往引发诸多关于文学与文化的论争和思考。所以，对已走过百年历程的东方诺贝尔文学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思考，在文学和文化这两个层面均有着特殊的意义。首先，总结百年来东方诺贝尔文学的创作经验，对已经走向世界的东方作家的作品进行系统阐释，深入挖掘其思想特点和审美价值，为读者的阅读和作家的创作提供一定的借鉴，是本课题研究的出发点和首要目标。其次，中国与其他东方国家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国文学也是东方文学的重要一脉。对东方获奖作家作品进行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上重建东方文学话语，探寻东方文学的现代转型之路，对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再次，文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东方诺贝尔文学是百年来东方文化迁衍流变的鲜明体现。通过对东方诺贝尔文学现象的研究，梳理东方文化在西方从被发现、接受到主动寻求对话的一般过程，总结东方文化踟躅中前行、曲折中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于提升文化自觉与民族自信，积极参与东方文化复兴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最后，东方诺贝尔文学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不仅反映了近百年西学东渐的历史，而且内蕴着这些作家对东西方文化问题的思考，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冲突问题研究的标本。通过对这些具有跨文化特点的东方作家的研究，探寻消弭文化冲突、实现平等对话的前景及途径，对于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实现多元文化和谐共存，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课题研究分总论和个案研究两部分。总论部分选取了几个角度，对东方诺贝尔文学这一重要的文学和文化现象进行总体性的研究和阐释，既是对获奖作家们创作经验的提炼、对其思想文化意蕴内涵的发掘，又是对百年东方文学和文化的宏观梳理、把握和反思。个案部分对获奖作家分别进行专题研究，以期对各位作家的思想和创作有一个较为细致、深入的了解。^①

^① 限于文献资料、语言能力和时间精力，关于阿格农和帕慕克的专题研究没有展开。莫言获奖前后国内已有诸多深入独到的研究成果出现。所以，个案研究部分这几位作家的专题研究暂付阙如，但在总论部分适当涉及，以尽可能保证研究的系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

一 东方的发现

东方诺贝尔文学现象是东方文学百年发展历程的缩影，也是东方文化百年迁衍流变的折射。细细回顾和梳理百年来东方作家的获奖，可以发现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由偶然发现到主动接受的过程。100多年前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西方人有机会发现东方。20世纪后期以来，东方作家获奖的频率不断加快，体现了西方人对东方的主动发现和对东方文化的不断接受。

20世纪上半期，东方作家中只有泰戈尔一人获奖，授奖辞中还说他已经进入英国文学之列，因此曾有人戏称泰戈尔是半个东方作家。然而，即使只算半个东方作家，他的获奖也使西方人有机会发现东方，尽管这个机会来得有些偶然。1912年，泰戈尔前往英国旅行，在此前后他将自己的部分孟加拉语诗歌翻译成英文，带到伦敦以诗会友。这些诗歌以其宁静深邃的精神境界和神圣真挚的情感表现征服了众多英语诗人、作家和艺术家。著名诗人叶芝在后来为《吉檀迦利》写的序言中说：“当我坐在火车上、公共汽车上或餐厅里读着它们时，我不得不经常阖上本子，掩住自己的脸，以免不相识的人看见我是如何激动。……这些诗的感情显示了我毕生梦寐以求的世界。这些诗歌是高度文明的产物。”^①诗人兼理论家爱兹拉·庞德也发表了评论文章，他说：“这种深邃的宁静的精神压倒了一切。我们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新希腊。象是平稳感回到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一样，它使我感到，一个寂静的感觉来到我们机械的轰鸣中。”应该说，这种评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除此之外，庞德还将泰戈尔的诗与西方时尚文学进行了对比，指出：“他具有自然的宁谧。这些诗似乎不是风暴或激越的产物，而只是显示了他日常的脾性。他与大自然浑为一体，没有任何矛盾。这一切与西方的时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西方，我们若要取得‘巨大的戏剧效果’，那么人必须表现为竭力要驾驭大自然。这一切与古希腊对人的描写及众神的嬉戏也形成了对比。……总之，我在这些诗中发现了一种极其普通的情感，使人想起在我们西方生活的烦恼之中、在城市的喧嚣之中、在粗制滥造的文艺作品的尖叫之中以及在广告的旋涡之中常

^① [印度] 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泰戈尔传》，倪培耕译，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第264—265页。

常被忽视的许许多多的东西。”^① 这些评论表现了对东方文化的惊奇发现，东方文化的宁静深邃让这些长期身处现代机械轰鸣中的西方文化人感受到了异质文化的独特魅力。正是这些西方文学精英的发现和认同，使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东方诗人泰戈尔击败了众多竞争对手，赢得了19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之后，更多西方人通过泰戈尔和他的作品认识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法国作家让·居埃农写道：“这些理想与我们的理想是大相径庭的，它至少给了我们欧洲思潮的相对性的认识。我们没有很好地理解：千百万人在与我们不同的理想基础上被抚育着，生活着。”冰岛作家拉克斯奈斯也说：“一个令人敬慕的上帝，泰戈尔的上帝：伟大的朋友，世界的情人，洁白的莲花，坐在河心中摇晃着的小舟上吹着横笛的陌生人！与泰戈尔类似的上帝可以在地中海地区犹太人的《圣经》诗里找到，你可以在中国的《道德经》里见到。但在欧洲，从中世纪以来，恐怕没有他的任何代表。”^② 的确，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客观存在，在泰戈尔获奖之前也并非没有人意识到这种差异，但这种认识大多源自对异质文化的猎奇欣赏或有意利用，还谈不上对东方文化的真正发现和理解。在东西方的历史地位已发生明显变化的20世纪初期，举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却由来自东方的泰戈尔获得，“东方”才真正在文化意义上引起西方人的关注，尽管这种关注和发现中有着许多偶然因素。试想，如果泰戈尔当初没有把自己的作品主动从孟加拉文译为英文，如果没有叶芝等人在推荐和出版等方面的帮助，我们很难想象泰戈尔会在西方人对东方抱以总体歧视的20世纪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尽管泰戈尔的文学成就无与伦比。即使在他获奖之后，授奖者也有不同的理解，如雅奈先生在《授奖辞》中认为，泰戈尔的《吉檀迦利》等作品“已经名副其实地归入英国文学”，因为“自从伊丽莎白女皇时代以来，这种诗歌艺术一直伴随着不列颠的文明扩张，永不凋谢”。他认为泰戈尔诗歌的全人类性是基督教传教事业的成果，他说：“基督教传教事业也在印度起到了妙手回春的作用。……基督教传教事业

① [印度] 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泰戈尔传》，倪培耕译，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第266—268页。

② 同上书，第284、287页。

的影响远远超出改变宗教信仰的工作范围。”^①也就是说，在他们眼里，泰戈尔并非东方文化的真正代表，他的获奖并非是对东方文化成就的肯定，相反，却是拜西方文化所赐。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泰戈尔之后的半个世纪里没有第二位东方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直到20世纪后期，东方作家才开始频频引起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关注。继以色列作家阿格农1966年获奖之后，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获得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而且是第一个因民族性（即出色地表现了民族文化特色）而赢得该奖的东方作家。瑞典皇家文学院常务理事、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斯特林在《授奖辞》中强调：“川端先生明显地受到欧洲近代现实主义的影响，但是，川端先生也明确地显示出这种倾向：他忠实地立足于日本的古典文学，维护并继承了纯粹的日本传统的文学模式。在川端先生的叙事技巧里，可以发现一种具有纤细韵味的诗意。……川端康成先生的获奖，有两点重要意义。其一，川端先生以卓越的艺术手法，表现了道德性与伦理性的文化意识；其二，在架设东方与西方的精神桥梁上做出了贡献。”^②这与半个世纪之前泰戈尔获奖时《授奖辞》的表述有着明显、深刻的差异，开始体现出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主动发现和接受。《授奖辞》还称川端康成“以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实质”。^③此处的“日本人的精神实质”又译为“最具民族性的日本灵魂”，指的是什么？许多人曾试图做出解释却不得要领。对此，还是百年前东方诗圣泰戈尔的理解比较深刻，他认为：“日本创造了一种具有完美形态的文化，发展了一种视觉，从美中发现真理，从真理中发现美。”川端康成对泰戈尔的这一理解非常认同，他将自己的获奖演说命名为《我在美丽的日本》，获奖之后赴美访问时，他将演讲题目定为《美的存在与发现》，并反复引用泰戈尔的话语。日本古代诗学中有一个体现审美修养的范畴称为“风雅”，对此，川端康成也在演讲中进行了阐

① [印度]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饥饿的石头》，倪培耕等译，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第539—542页。

② 高慧勤主编：《川端康成十卷集》第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46页。

③ [瑞典] 安德斯·奥斯特林：《授奖辞》，高慧勤译，《川端康成十卷集》第10卷附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46页。

释：“风雅，就是发现存在的美，感受已经发现的美，创造有所感受的美。”^① 川端康成在创作和演讲中对民族性的深刻展示，有助于西方人进一步发现和了解东方文化。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到 21 世纪初，东方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异乎寻常地频繁起来，二十几年的时间内先后有八位东方作家（马哈福兹、戈迪默、大江健三郎、库切、帕慕克、莫言，外加两位移民作家）获此殊荣。后 20 年的热络与前 80 年的冷落形成鲜明的对照。西方对东方文学认可和接受的这种加速度是偶然现象吗？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出于对历史欠账的补偿而有意识地进行倾斜照顾吗？——显然不能做如此简单浅薄的理解。我们认为，东方作家的频繁获奖，是经过转型更新的东方文学发展进步的标志；是经过近百年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互动后，歌德所期望、马克思所展望的世界文学时代终于来临的标志；同时，也是西方的知识精英们对东方文化主动发现和不断接受的结果。

二 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由于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历史变迁等因素，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的差异客观存在，如尚德与尚力、尚同与尚异、忧患意识与悲剧意识、民生主义与民主主义、耻感与罪感、人治与法治，等等。^② 15 世纪以前，东西方文化基本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只有局部碰撞而没有大规模的交流。16 世纪至 20 世纪初的“西学东渐”才使东西方文化历史性地相遇。西学东渐对东方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在东方各国引发了持续不断的文化碰撞和冲突，在宗教信仰、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教育方式、生产方式等各个领域和层面均有表现。东西方文化的这种差异性和碰撞冲突曾一定程度上被人为放大，如英国诗人吉卜林就曾在其诗作中喊出“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二者永不交汇”，成为以灰色视野观照东方、对东西方文化关系持悲观态度的一个代表。影响最大的当属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将世界划分为八大文明系统，并认为这些文明之间的差异比政

① [日] 川端康成：《美的存在与发现》，叶渭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34 页。

② 参阅侯传文《东方文化通论》，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30—332 页。

治、阶级的差异更具有永恒性，未来世界格局将由不同文明之间的对立互动而构成。^①然而，东西方文化有相异性的内容，也有相通性的成分；有碰撞冲突的一面，也有交流融合的一面。进入20世纪特别是下半叶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东西方文化已呈现出江河入海式的交流、融合态势。特别是包容性极强的东方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已明显表现出对狭隘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超越和摒弃，正以一种更加理性、科学、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②，致力于民族文化复兴，参与世界文化对话。

东方诺贝尔文学正是东西方文化相冲突、相融合这一时代语境下的产物。作为成长于这种冲突与融合大背景下的一代文化人，东方诺贝尔作家们的思想和创作中不乏对这一问题的体验、反映和思考。泰戈尔在少年时代就通过学校和家庭教育接受西方文化，后来又曾多次赴欧洲求学、访问。这些经历使他结识了一批西方文化界的精英，接触和认识到西方文化的精华，从而在思想上得到熏陶、精神上得到充实。面对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冲突，泰戈尔选择既接通民族精神血脉、也从西方文化中汲取营养的兼收并蓄态度。他赞美和宣扬东方文化，也称颂和向往西方文化；他揭示和指斥印度传统文化中的种姓壁垒、对妇女的歧视和戕害，也揭露和批判西方文化中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庸俗和低下。总之，面对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冲突，泰戈尔既不偏于西方中心主义，也不囿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倡导一种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后的新文化。在题为《文明的汇合》的演讲中，他集中阐述了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合作的理想：“人的无限个性能够在整个人类的光辉汇合里体现。我请求印度成为世界所有民族合作的代表。……把我们的精神同西方精神割裂开来的当前的种种企图，犹同精神自杀。”^③他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戈拉》既否定了依附英国的殖民

①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载美国《外交事务》1993年夏季号）一文中首先提出“文明冲突论”，引起较大争议。他在其后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发挥，在一些说法上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参阅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② 鲁迅：《文化偏至论》，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③ [印度]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泰戈尔传》，倪培耕译，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第365页。

化倾向，也否定了不加区分地以恢复古代传统来对抗殖民化的倾向。在作品中，主人公戈拉本是爱尔兰夫妇的孩子，被印度一对开明的婆罗门夫妇收养。他从小接受西方式教育，经常用英语发表演讲，反对偶像崇拜等印度教习俗；后来又钻研印度传统的吠檀多哲学，反击西方传教士对印度社会和宗教的攻击。他成立了印度教协会，与主张印度教改革的梵社对立。他为了固守教派观念，不惜拒绝“梵社”姑娘苏查丽姐的爱情，割断同好友毕诺业的友情。他为印度的尊严进行辩论、奔走甚至承受牢狱之灾，却因身上流的是外国人的血而没有资格举行涤罪仪式。最后，得知自己身世后深受震撼的戈拉决意为“没有种姓、不分贵贱、没有仇恨”的印度而献身。这部旨在揭示印度社会矛盾、反映时代变迁的作品，客观上即暗蕴了作者的东西文化观。此外，中篇小说《四个人》通过主人公沙奇士在西方现代科学和印度传统宗教情感之间的徘徊来表现近代印度知识分子精神探索的艰难历程。长篇小说《最后的诗篇》则以毕业于牛津大学、生活方式西方化、思想上主张反传统的青年律师阿米德的爱情波折为线索，表现了东西方文化在爱情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和冲突。这些作品均发表于20世纪初叶，虽然创作主旨并非致力于表现东西方文化冲突，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作者对这一问题的超前思考。

索因卡出生于尼日利亚西部约鲁巴部族聚居的小镇阿贝奥库塔，父母均为基督教徒，使他从小就受到非洲传统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双重熏陶。大学毕业后，索因卡曾赴英国留学，后来又因受到军政府迫害而流亡欧美多年，对西方文化有着切身的体验和认知，对东西文化冲突以及如何应对这种冲突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表现。在剧作《沼泽地的居民》中，他以非洲乡村经济的凋敝、淳朴人情的丧失为切入点，集中表现了西方殖民文化对非洲传统文化的破坏。另一剧作《狮子和宝石》通过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年轻教师在与腐朽昏聩的老酋长的爱情角逐中败北这一事件，反映出西方新文化在强大的传统守旧势力面前的无奈和尴尬，同时也对崇奉“月亮也是西方的圆”这种文化偏媚倾向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死亡和国王的侍从》则是争议较大的一部悲剧作品。虽然作者在该剧引起轰动之后一再申明自己的创作目的绝非单纯表现文化冲突，但导致悲剧发生的客观原因，却是艾雷辛父子和英国殖民官员皮尔金斯分别秉持的非洲约鲁巴文化与欧洲文化在生死观念方面的差异和隔阂。然而，在对非欧文化冲突进行揭示和表现的同时，索因卡并未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思维陷阱，他曾对

非洲大陆盛行一时的“黑人性”文化运动泼以冷水，他尖锐地指出：“黑人文化自豪感使自己陷入被动，虽然它的口音是刺耳的，句法是夸张的，战略是富于进攻性的——黑人文化自豪感仍然处在对于人及其社会分析的欧洲中心论设定的机构之中，并试图用这些外化了的观念重新定义非洲及其社会。”^①他一方面为非洲大陆反抗殖民统治意识的觉醒而欣慰，另一方面又清醒地认识到，黑人种族意识实际上也是一种“他者化”意识，面对欧洲文化，如果选择完全拒绝与对峙，那么非洲黑人文化将长期深陷野蛮化、非理性化的泥淖而不能自拔。此外，索因卡也对在反抗殖民化的过程中出现的极端暴力与恐怖现象予以了公开谴责。

马哈福兹出生并成长于 20 世纪的埃及。埃及是东方文明古国，有着几千年的灿烂文化，有着引以为荣的过去，但同时也为此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腐朽沉滞的传统观念和各种形式的原教旨主义成为实现社会进步和人民自由的最大障碍。与此同时，西方文化却在以各种方式对 20 世纪的埃及社会进行着荡涤和冲击，其中，埃及伊斯兰宗教信仰与西方现代科技文明的冲突最为激烈。马哈福兹对此有着深切的体察，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处于东西方文化冲突期埃及社会的价值寻求和理想重建进行不懈探索，而这种探索对埃及、对阿拉伯世界乃至整个东方社会都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开罗三部曲”即是集中表现这种探索的代表作。全书分别以艾哈迈德家族三代人的主要生活场景——开罗的三个街区两宫间、思慕宫和怡心园为题，描绘出 20 世纪上半叶开罗这一家三代人的生活选择和精神变迁，并由此表现出处于现代转型期的埃及民族面对西方科技文明冲击时的无奈、彷徨和抉择。《思慕宫》中的主人公凯马勒是该时期埃及众多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凯马勒自幼对父亲唯命是从，笃信伊斯兰教，受到较多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他又善于思考，关注埃及命运。二哥法赫米为国捐躯后，他受到很大震动，参加了爱国的华夫脱党。入读大学之后，西方科学民主等开明思想的洗礼又激发起他对科学和真理的探求热情。于是，家庭与社会、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矛盾，使他陷入苦闷、迷惘的精神困境。这是埃及一代有思想的知识分子精神成长的过程，这种精神迷惘正是东西新旧思想碰撞冲击过程中所产生的阵

^① [美] 爱德华·W. 赛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326 页。